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品系列
shanghaisongqinglinggujujinianguan
cangpinxilie

宋庆龄书信选编

songqingling
shuxinxuanbi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品系列
shanghaisongqinglinggujujinianguan
cangpinxilie

宋庆龄书信选编

songqingling
shuxinxuanbian

上海辞书出版社

编委会

顾问

秦量 马玉成

主编

陆柳莺 金晓春

副主编

董卫 麦灵芝

译审

隋丽君

编译

宫洁菁 郑培燕 王宁宁



出版说明

在宋庆龄逝世 31 周年之际，我们在 1995 年出版的《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馆藏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的基础上，重新编辑了这本《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品系列——宋庆龄书信选编》。删减了别人给宋庆龄的书信和非本馆所藏的复印信件，增加了新近整理翻译的宋庆龄书信和电报稿，其中的英文书信和电报的译文又请专家作了统一修订。

这封书信选编，按时间顺序收入宋庆龄从 1927 年至 1980 年间的书信 295 封，其中有些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选入的书信，都是本馆藏品，绝大部分是从宋庆龄在上海寓所的遗物中整理出来的，因此，所据书信和电报多为底稿或是副本，少数几封是实寄信。

这些书信，记录了宋庆龄与国内外政要、朋友、亲属、故旧的交往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庆龄的人生经历，包括她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以及情感等内心世界。不少书信还涉及她的政治观点和立场、工作方式、生活情趣等，对于了解和研究宋庆龄以及她所处的那个时代，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刊印的书信尊重原件，只有极个别书信作了文字标点的订正。因为大多是依据信的底稿或副本，所以有的信尾有宋庆龄的签名，有的没有签名，本书也都依照原件不作增删。根据外文底稿译出的书信，内中数字均统一为阿拉伯数字；以中文底稿为依据的书信，均依原件，对数字未做处理。每封信的日期都统一标在标题之下，原来没有日期，后经考证确定的都加注说明。对信中提及的相关人物、团体、刊物等，在书中第一次出现时，酌作注释。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2012 年 5 月

目录

1927年12月10日 致国际反帝大同盟
1927年12月23日 致汪精卫、蒋介石
1927年12月23日 致蒋介石
1943年6月16日 致弗农
1943年7月14日 致印度人民
1943年10月5日 致纽约《新群众报》
1944年2月17日 致梁寒操
1946年8月 致科林·麦克唐纳
1946年8月23日 致斯潘塞·摩萨
1946年9月2日 致斯潘塞·摩萨
1946年11月10日 致格雷·格兰尼奇
1946年11月13日 致艾莎贝尔·克里普斯

1947年1月9日 致乔治·布雷泽勒

目录

1	1927年12月10日 致国际反帝大同盟	22	1947年1月9日 致乔治·布雷泽勒
3	1927年12月23日 致汪精卫、蒋介石	24	1947年5月15日 致爱德华·卡特夫人
4	1927年12月23日 致蒋介石	26	1947年5月30日 致卡尔逊
6	1943年6月16日 致弗农	27	1947年6月16日 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10	1943年7月14日 致印度人民	29	1947年6月18日 致爱德华·卡特夫人
11	1943年10月5日 致纽约《新群众报》	31	1947年7月3日 致谢葆樵
12	1944年2月17日 致梁寒操	33	1947年8月30日 致孟长泳
14	1946年8月 致科林·麦克唐纳	35	1947年9月 致弗兰克·泰勒
17	1946年8月23日 致斯潘塞·摩萨	38	1947年 致弗兰克·泰勒
19	1946年9月2日 致斯潘塞·摩萨	40	1947年 致胡卡姆夫人
20	1946年11月10日 致格雷·格兰尼奇	43	1948年3月8日 致朋友们
21	1946年11月13日 致艾莎贝尔·克里普斯	50	1948年4月9日 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 | | | | |
|----|---------------------------|----|--------------------------|
| 52 | 1948年4月17日
致蔡卓民 | 70 | 1949年2月8日
致杨孟东 |
| 53 | 1948年5月24日
致邱茉莉 | 71 | 1949年2月12日
致弗雷达·柯奇华 |
| 54 | 1948年8月13日
致爱泼斯坦 | 72 | 1949年2月28日
致友人 |
| 56 | 1948年8月17日
致莫德·拉塞尔 | 75 | 1949年3月10日
致利尔泰德 |
| 57 | 1948年8月25日
致弗兰克·泰勒 | 77 | 1949年3月21日
致克拉克·福尔曼 |
| 58 | 1948年12月1日
致马丁·诺林 | 81 | 1949年4月8日
致阿黛尔·肯辛格 |
| 59 | 1948年12月16日
致彼得 | 83 | 1949年5月24日
致玛丽·C·赖特夫人 |
| 60 | 1948年12月27日
致孟长泳 | 85 | 1949年6月
致詹姆斯·贝特兰 |
| 61 | 1949年1月16日
致史蒂文森夫人 | 88 | 1949年9月10日
致亨利·华莱士 |
| 62 | 1949年1月21日
致马塞尔·朱诺德 | 89 | 1949年10月
致中国福利基金会全体职员 |
| 64 | 1949年1月22日
致厄克特 | 91 | 1949年10月21日
致邓小姐 |
| 65 | 1949年1月22日
致伊丽莎白·曼·博齐斯 | 92 | 1949年10月24日
致曾宪植 |
| 66 | 1949年1月24日
致埃迪 | 93 | 1949年10月31日
致斯大林 |
| 68 | 1949年1月
致威拉德·科夫人 | 94 | 1949年10月31日
致约翰·金斯伯里 |
| 69 | 1949年2月
致亨利·华莱士 | 95 | 1949年10月31日
致C·B·鲍德温 |

- | | | | |
|-----|-----------------------|-----|--------------------------|
| 97 | 1949年11月1日
致林菲尔德 | 124 | 1950年5月22日
致陈毅 |
| 99 | 1949年11月14日
致亨利·舒曼 | 125 | 1950年5月25日
致周恩来 |
| 100 | 1949年12月9日
致格兰尼奇 | 127 | 1950年5月30日
致陈毅、潘汉年 |
| 101 | 1949年12月17日
致古利奇 | 128 | 1950年6月3日
致毛泽东 |
| 102 | 1949年12月19日
致耿丽淑 | 129 | 1950年6月6日
致周恩来 |
| 107 | 1949年
致埃迪 | 131 | 1950年6月6日
致毛泽东 |
| 109 | 1950年1月5日
致水泽耶奈 | 132 | 1950年6月13日
致耿丽淑 |
| 110 | 1950年1月5日
致宫本百合子 | 134 | 1950年6月17日
致周恩来 |
| 112 | 1950年1月17日
致美国友人 | 135 | 1950年6月17日
致海伦·R·布赖恩 |
| 114 | 1950年2月2日
致科伦泰夫人 | 136 | 1950年6月26日
致艾达·贝尔·杰克逊 |
| 115 | 1950年2月22日
致沈兹九 | 138 | 1950年6月27日
致威廉·佩特森 |
| 116 | 1950年3月2日
致伦诺克斯夫人 | 139 | 1950年7月4日
致博西克 |
| 117 | 1950年3月3日
致多丽士麦克里 | 141 | 1950年7月5日
致周恩来 |
| 118 | 1950年5月4日
致周恩来 | 142 | 1950年7月6日
致耿丽淑 |
| 122 | 1950年5月18日
致周恩来 | 144 | 1950年7月12日
致路易·艾黎 |

- 146 1950年7月14日
致周恩来 166
- 148 1950年7月18日
致捷克大使 170
- 149 1950年7月25日
致邓颖超 171
- 150 1950年8月10日
致周恩来 172
- 152 1950年8月11日
致吴之恒 173
- 153 1950年8月23日
致廖介生 174
- 154 1950年9月12日
致鲁登科 175
- 155 1950年9月23日
致周恩来 176
- 157 1951年1月12日
致康克清 177
- 158 1951年2月3日
致卫生部 179
- 159 1951年2月5日
致克劳特夫人 180
- 160 1951年2月13日
致李云 181
- 161 1951年2月20日
致约里奥-居里 182
- 163 1951年2月21日
致中国福利会主席办公室 183
- 164 1951年3月15日
致中苏友好协会总会 184
- 1951年3月28日
致周恩来 166
- 1951年4月5日
致伍云甫 170
- 1951年4月10日
致中国福利会工会 171
- 1951年4月12日
致中国福利会儿童剧团 172
- 1951年4月13日
致周恩来 173
- 1951年4月13日
致符拉吉米洛夫 174
- 1951年4月13日
致蔡畅 175
- 1951年4月13日
致中苏友协总会 176
- 1951年4月13日
致西摩夫人 177
- 1951年4月14日
致罗申 179
- 1951年4月18日
致巴菲洛娃 180
- 1951年4月18日
致保加利亚和平委员会主席 181
- 1951年4月18日
致波兰妇联主席 182
- 1951年4月19日
致北京电业局中苏友好协会 183
- 1951年4月19日
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粤中分会 184

- 185 1951年4月19日
致捷克布拉格民主妇联 185
- 186 1951年4月19日
致世界和平理事会秘书处 186
- 187 1951年4月19日
致布尔金 187
- 188 1951年4月23日
致黎氏钊 188
- 189 1951年4月24日
致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研究出版部 189
- 190 1951年4月25日
致捷克斯洛伐克世界和平大会 190
- 191 1951年4月25日
致吴耀宗 191
- 192 1951年4月28日
致乔冠华 192
- 193 1951年4月28日
致郭沫若 193
- 194 1951年4月
致彼得柯夫 194
- 195 1951年4月
致罗友兰 195
- 196 1951年4月
致方王颖 196
- 197 1951年4月
致黄静汶 197
- 198 1951年4月
致诸昌年及夫人 198
- 199 1951年4月
致芜湖皖南抗美援朝会 199
- 200 1951年4月
致南充川北区抗美援朝分会 200
- 201 1951年5月2日
致布尔金 201
- 202 1951年5月9日
致《人民中国》社 202
- 203 1951年5月9日
致人民出版社总编室 203
- 204 1951年5月10日
致郭沫若 204
- 205 1951年5月22日
致《人民中国》编辑 205
- 206 1951年6月2日
致人民出版社总编室 206
- 207 1951年6月7日
致威勒 207
- 208 1951年6月8日
致罗叔章 208
- 210 1951年6月16日
致李云 210
- 213 1951年7月28日
致乔治·布雷泽勒 213
- 214 1951年8月2日
致外交部办公厅 214
- 215 1951年8月9日
致郭沫若 215
- 216 1951年8月14日
致罗叔章 216

- 217 1951年12月13日
致中苏友协上海分会中福会
支会
- 218 1951年12月17日
致金仲华
- 220 1951年12月17日
致比尔
- 221 1951年12月18日
致中国福利会工作人员
- 222 1951年12月24日
致有吉幸治
- 223 1951年12月24日
致郭沫若
- 224 1952年1月2日
致朋友
- 226 1952年1月12日
致罗叔章
- 228 1952年1月24日
致费奥雷拉·德尔拉·塞
特夫人
- 229 1952年2月6日
致吉洪诺夫
- 230 1952年2月16日
致罗叔章
- 231 1952年2月6日
致《人民中国》
- 232 1952年2月
致康克清
- 234 1952年4月5日
致罗叔章
- 235 1952年4月6日
致中国福利会主席办公室
- 236 1952年
致潘汉年
- 237 1952年4月15日
致金仲华
- 239 1952年4月26日
致尼泊尔妇女会议
- 240 1952年4月26日
致中国福利会办公室
- 241 1952年5月17日
致刘宁一
- 242 1952年5月24日
致耿丽淑
- 244 1952年5月24日
致金仲华
- 246 1952年5月24日
致朋友
- 248 1952年5月26日
致郭沫若
- 249 1952年
致耿丽淑
- 251 1952年6月2日
致刘宁一
- 252 1952年6月6日
致刘宁一
- 253 1952年6月10日
致曹葆贞
- 254 1952年6月10日
致漳州归侨联谊会

- 255 1952年6月13日
致罗叔章
- 256 1952年6月
致耿丽淑
- 258 1952年7月17日
致罗叔章
- 259 1952年7月28日
致陈翰笙
- 261 1952年8月22日
致罗叔章
- 263 1952年12月29日
致左雅女子学校学生们
- 264 1952年
致中国福利会全体同仁
- 265 1953年3月3日
致李云
- 266 1953年3月5日
致斯大林
- 267 1953年3月6日
致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
部长会议主席团
- 268 1953年3月11日
致罗叔章
- 269 1953年3月12日
致中国福利会全体工作人员
- 270 1953年3月13日
致沈兹九
- 271 1953年5月6日
致崔承喜
- 272 1953年5月8日
致《人民中国》编辑部
- 273 1953年5月8日
致邓颖超
- 274 1953年5月21日
致罗叔章
- 275 1953年5月31日
致全体从事儿童保育和儿童
教育工作的同志们
- 277 1953年6月8日
致罗叔章
- 278 1953年6月13日
致罗叔章
- 279 1953年7月11日
致罗叔章
- 280 1953年7月24日
致罗叔章
- 281 1953年7月27日
致邓颖超
- 282 1953年7月27日
致罗叔章
- 284 1953年12月14日
致周恩来
- 285 1953年12月17日
致林达光
- 287 1953年12月19日
致《人民中国》编辑部
- 288 1953年12月21日
致周恩来

- 367 1960年1月6日
致唐明照
- 369 1960年2月7日
致李云
- 370 1960年4月15日
致阿尼西莫夫
- 371 1960年9月20日
致依·加里宁娜
- 372 1960年11月3日
致埃德加·斯诺
- 374 1960年11月9日
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 376 1961年3月22日
致达夫
- 377 1962年10月11日
致章汉夫
- 378 1965年12月
致程瑞庭等
- 379 1966年7月13日
致龚澎
- 383 1967年4月27日
致李燕娥
- 384 1967年7月24日
致李燕娥
- 385 1968年6月8日
致史美芬
- 386 1969年9月27日
致弗兰克·泰勒
- 388 1969年10月29日
致张珏
- 389 1970年8月12日
致周玉人
- 390 1972年12月21日
致莉莲·福克斯
- 392 1972年12月23日
致罗叔章
- 393 1977年9月18日
致李燕娥
- 394 1978年8月4日
致张甦平
- 395 1978年8月31日
致张甦平
- 396 1979年5月9日
致彭冲、王一平
- 397 1979年12月18日
致李燕娥
- 398 1979年12月22日
致李燕娥
- 399 1979年12月
致胡允平、盛学素
- 400 1980年1月5日
致李燕娥
- 402 1980年1月16日
致李燕娥
- 404 1980年2月4日
致李燕娥
- 405 1980年2月8日
致李燕娥、周和康
- 406 1980年2月16日
致李燕娥

- 407 1980年5月30日
致张甦平
- 408 1980年7月18日
致张甦平
- 409 1981年1月23日
致张甦平、李家炽
- 410 1981年1月23日
致陈国栋、汪道涵
- 411 1981年1月31日
致李家炽
- 412 1981年4月6日
致李家炽

局势所迫、未克与会，甚感遗憾。强烈要求大会以加倍的努力开展反对中国反动恐怖和军事独裁——他们尤其得到英日帝国主义分子的积极帮助和怂恿——的斗争。革命农工的英勇斗争理应得到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大力帮助，因为这是在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上打开的第一个重要缺口。所以，所有被压迫阶级和民族应当集中精力，以一切力量和手段来捍卫革命中国的斗争，因为革命的中国的目的也是争取他们自身自由的最重要的前线。

大会应当立即采取的第一个步骤，也是最为切实可行的步骤，是在全世界组织起民众，要求帝国主义者把所有军队和炮舰立即撤出中国领土。没有这些军队和炮舰的支持，反动派很不容易被民众推翻。第二，要求废除那些把中国的财政及经济大权交到帝国主义手中，使中国沦至比殖民地更糟之地的不平等条约。第三，中国的反动派以革命辞藻做幌子，以此来误导其他国家的民众摘下这个假面具，在世人面前揭露这些反动派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反动派及最驯服的帝国主义工具的真面目。

宋庆龄
(中英文电报稿)

367	1954年12月1日	致李瑞珩、李瑞珩	410	1977年12月30日	致李瑞珩、李瑞珩	407
368	1955年11月1日	致李瑞珩、李瑞珩	411	1978年1月18日	致李瑞珩、李瑞珩	408
370	1960年8月1日	致李瑞珩、李瑞珩	412	1978年12月1日	致李瑞珩、李瑞珩	409
371	1960年9月30日	致李瑞珩、李瑞珩	392	1977年9月18日	致李瑞珩	
372	1960年11月3日	致李瑞珩、李瑞珩	394	1978年8月4日	致李瑞珩	
374	1960年11月9日	致安部、路易、斯特	395	1978年8月31日	致李瑞珩	
376	1961年1月22日	致达夫	396	1979年5月9日	致彭冲、王平	
377	1962年10月11日	致达夫	397	1979年12月18日	致李瑞珩	
378	1965年12月	致程潜等	398	1979年12月23日	致李瑞珩	
379	1966年7月13日	致宋邵	399	1979年12月	致胡允平、李素素	
380	1967年4月27日	致李瑞珩	400	1980年1月5日	致李瑞珩	
384	1967年7月24日	致李瑞珩	402	1980年1月16日	致李瑞珩	
385	1968年6月8日	致史黄芬	404	1980年2月4日	致李瑞珩	
386	1969年9月27日	致非涅克、李勃	405	1980年2月8日	致李瑞珩、李瑞珩	
388	1969年10月29日	致李瑞珩	406	1980年2月16日	致李瑞珩	

致国际反帝大同盟^①

1927年12月10日

国际反帝大同盟

布鲁塞尔

局势所迫，未克与会，甚感遗憾。强烈要求大会以加倍的努力开展反对中国反动恐怖和军事独裁——他们尤其得到英日帝国主义分子的积极帮助和怂恿——的斗争。革命农工的英勇斗争理应得到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民族的大力帮助，因为这是在世界帝国主义壁垒上打开的第一个重要缺口。所以，所有被压迫阶级和民族应当集中精力，以一切力量和手段来捍卫革命中国的斗争，因为革命的中国目前也是争取他们自身自由的最重要的前线。

大会应当立即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也是最为切实可行的步骤，是在全世界组织起民众，要求帝国主义者的所有军队和炮舰立即撤出中国领土。没有这些军队和炮舰的支持，反动派很容易被中国民众推翻。第二，要求废除那些把中国的财政及经济大权交到帝国主义手中，使中国沦至比殖民地更糟之境地之不平等条约。第三，中国的反动派以革命辞藻做幌子，以此来误导其他国家的民众。要撕下这个假面具，在世人面前揭露这些反动派作为中国历来所见到的最血腥的反动派及最驯服的帝国主义工具的真面目。

宋庆龄

(据英文电报底稿)

^①反帝大同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是由维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 1927年2月在布鲁塞尔创办。其宗旨是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统治的斗争。

致国际反帝大同盟

这个组织的建立是共产国际统一战线策略的一部分，得到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苏联作家高尔基等人的积极支持。

宋庆龄

(据国际反帝大同盟)

致汪精卫、蒋介石

1927年12月23日

正当我准备返国之之际，获悉你们打算与苏俄断交^①并要求撤走苏联领事馆。此举若实行，必将使中国陷入自杀性的孤立，阻碍中国的进步。对此，历史将追究你们的责任。假如你们有一丁点儿你们领袖的那种远见或者还记得与苏俄紧密合作是领袖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以免拖着国家的命运一道坠入深渊。我将留在这里，作为对你们的决定的道义抗议，除非你们在最后一刻采取行动撤销断交的决定。我相信，你们所说的不平之事，是可以通过与苏俄达成协议来解决的。

孙宋庆龄

(据英文电报底稿)

^①与苏俄断交，指1927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因广东事变，发布与苏俄断绝邦交令并于次日向苏联驻沪总领事递交断交通牒，限苏领事一日内出境。

致蒋介石

1927年12月23日

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正如我的到来一样，是抗议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行动。说我可能是在别人的胁迫下行事，这完全是含沙射影的攻击，是一种无视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含沙射影的攻击，再一次证明了你的无端猜忌，它扭曲你的判断，导致灾难性的决定。至于要我亲自表明自己的想法，那只能使我回想起在汉口的经历：不仅压制我的声明，就连印刷这一声明的国民党员也受到无情迫害。这就是我没有答复以前给我的几份电报的原因。现在，面临着与唯一反帝大国断绝国家关系，我发表了意见。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觉得有义务就这个考验每一位诚实的国民党员的问题发出警告。不知道要求与苏俄断交是你个人的决定还是你周围那些腐朽分子的决定。你过去不止一次地抱怨他们，现在却听任他们把你彻底毁掉。这次互通电报表明，我们之间交换看法、写信谈论我们之间犹如鸿沟的分歧是毫无意义的。在与苏俄断绝关系——保持与苏俄的友谊是孙中山遗嘱中的既定政策——的同时，你却不仅无意同帝国主义列强断绝关系，而且现在自称是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的那个机构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包括你在内的国民党领导人甚至同派到殖民地般的中国的外国讨伐军的头目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你与帝国主义分子的交往就是英国政府拒绝发给我赴印度签证的原因，而我打算去印度是应印度国大党的邀请。如果我决定回国的话，唯一的目的是参加工农斗争。总理为了工农的福祉奋斗了40年，而今他们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

致蒋介石

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们敬爱的领袖在全世界革命力量的援助下使我国革命达到了伟大的高点，而你们却听任它变成口头上忠于孙中山的卑鄙无耻的军国主义分子的游乐场。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唯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我在离开汉口前的声明^①中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将和我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目前的血腥的反动派。背叛我们的事业，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曾使我们的领袖痛心，但却无法打垮革命。

宋庆龄

(据英文电报底稿)

^①指1927年7月14日在汉口《人民论坛报》上发表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致弗农^①

1943年6月16日

尊敬的弗农上校：

非常感谢你6月1日的来信。我一直在考虑你信中所说的问题，并想就其中的一些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我认为，要了解什么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有益的事情，并不是那么困难。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多的自由是有益的，生产更多的生活必需品是有益的，将这些产品供应给最广大的民众是有益的。当然，民众难免会犯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立在利他主义基础上的运动必然会造成伤害。相反，这种运动推动人类前进，尽管偶尔会发生倒退。想想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些战争吧，那些战争是血腥的，有时在那些失望的同代人看来可能是毫无用处的。然而，其结果却是建立了我们目前正在努力从纳粹的野蛮行径中解救出来的现代欧洲文化。想想法国大革命，也同样如此，最后取得的善果超过了所受的痛苦。再想想你们自己的美国革命，你们为美国而战，否则就不会有美国的存在。我认为，苏联人民也不会同意你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估计。他们为建立目前的国家忍受了巨大的苦难，请看他们正在如何为保卫自己取得的成果，同时也为保卫我们大家而战。如果没有经过多年的磨难，他们就不会拥有用以战斗的武器。如果他们不相信他们正走向伟大的未来，他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使用那些武器。

当然，民主是有瑕疵的。但民主也提供了纠正这些瑕疵的手段，

致弗农

选民们能撤换背叛他们的人。历史上存在过坦慕尼协会^②，但是它后来消亡了。尽管现在仍然存在政治流氓行径，但还不至于如此之坏。黑格失势了，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想我最近读到了有关人民也摆脱了彭德格斯特^③的控制的消息。

你认为中国人民对现状是满意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你难道没听说今年河南的饥荒饿死了500万到1000万人？而且你也看到了我们的吃不饱饭且待遇极差的士兵，正是我们的落后状况使我们的抗战成为如此痛苦不堪的事情。认为我们的人民愚昧到竟然安于现状的程度，这是对他们的侮辱，我要代表他们予以驳斥。美国的人口是由那些当年不堪忍受与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状况而逃往新大陆的人组成的，你的祖先大概也是这样做的。正是由于美国人民决心不把他们所逃离的那种压迫和痛苦移植到美国，美国今天的生活才有这么多充满希望的特点。当然会犯新的错误，出现新形式的压迫。但是，难道这些人比他们祖先的境遇更糟吗？绝对不是。怀疑教育、思想、希望、决心和行动在建立新的更美好的东西方面的力量，这是对美国赖以立国的那种精神的背叛。

假如我们走了美国的路，我们的境况会比现在更糟吗？当然不会。你见过我们的苦力、我们的农民和衣衫褴褛的士兵。假如我们走了美国的路，我们就不会有苦力、不会有农民了——而是会有拥有自尊和技艺的工人，强壮的农场主和受过教育、装备精良从而能击退企图从我们手中夺走我们国家的那些人的士兵。

致弗农

我认为，国家不分大小，都应有自决权。但是，他们必须拥有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民主，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民主。从来没有哪一个由人民意志统治的国家是具有侵略性的，因为它会把精力用于改善自己国民的生活。这样的国家会愿意同其他国家合作，因此，民族主义会导致国际主义。但是，试图通过践踏和吞并其他民族来实现某种国际秩序（我们当然需要国际秩序），正如纳粹目前所为，这只会埋下更深的憎恨和更血腥的战争的爆炸性种子。

道路是漫长的，也是——如你所说——艰难的。但是，让普通人提高素质、走向富裕、受到教育、变得高尚，这是我们唯一可走的道路。我们必须毅然决然、毫不怀疑地走这条道路。这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已经被打败了。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我们有权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如果在战场上击败外国反动派，结果反动派却在我们自己人中间重新滋生，那对我们又有何益？

感谢你的良好祝愿，希望你再给我写信，让我知道你的想法。

你诚挚的
宋庆龄

（据英文底稿）

①弗农上校(Colonel R. Vernon)，美国人。

②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美国历史上操纵纽约市政的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俗称。

③彭德格斯特(Thomas Joseph Pendergast, 1873—1945)，美国政治家，在密苏里州建立起强



致弗农

大的政治集团。1916年，成为堪萨斯市民主党的首领。他的政治集团控制了州和市的政治活动。后美国政府控诉他逃避缴纳所得税，判他在联邦监狱服刑1年零1天。

宋庆龄
（据英文底稿）



致印度人民^①

1943年7月14日

宋庆龄

谨向为自由和为保卫祖国免遭法西斯侵略而战的印度人民致敬。中国的经验证明，不打败想要奴役亚洲的日本法西斯，亚洲各民族的国民革命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我们需要那种承认少数党派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团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了将来而增强力量和自由。

宋庆龄 重庆

(据英文底稿)

①这封信是宋庆龄托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博士带回印度向公众发表的。

致纽约《新群众报》

1943年10月5日

(药品收到通知函)在中华民国成立32周年之际，我们必须记住，走向民主的进程好比学习游泳。要学会游泳不能只靠空谈，而是要下到水中。抗击日本军事法西斯的战争提供了又一个尺度。那些全力抗击侵略者的人对民主的贡献最大。美国朋友可以通过同等地支持所有实际参与抗日的力量来帮助中国实现民主。

宋庆龄

(据英文电报底稿)

致梁寒操^①

1944年2月17日

尊敬的梁先生：

我刚刚读了今天的《国民先驱报》上刊登的一篇中央社报道，报道称，你在昨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引用我的话说我从未对封锁北方游击区提出过任何抗议。

我自己的救援工作就包括设法为我们在那些地区的战士们运去医疗物资，但正如我在接受采访时告诉你的，这项工作经常受到封锁的阻碍。将近四年之前，八吨急需的医疗物资就受到阻止而无法运往目的地，最终被没收。这以后的三年多时间内，我们一直无法把任何物资运往北方。只是在去年夏天，周恩来先生和林彪将军乘坐的卡车得到豁免权，才给了我们向那里的医院运送可维持几星期的医疗物资的机会。

我想再强调一遍，先前被没收的物资，都是国外的捐赠者特别指定要运往那些地区的。对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些物资不能运送到那里，我当然不能让捐助者被蒙在鼓里。虽然我没向《雷诺新闻》提供任何消息或明确地向英国劳工发出呼吁，但我也绝没有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我不能否认过去四年中使我们成千上万的战士被剥夺了他们本该得到的医疗援助的原因，特别是鉴于自1938年以来，我与纽约的美国援华会^②及英国的中国运动委员会^③一道，一直是国际和平医院的发起人。许多中外人士为这间医院作出了牺牲，白求恩大夫和印度的柯棣华大夫为之献出了生命。

致梁寒操

你诚挚的
宋庆龄

(据英文底稿)

①梁寒操(1898—1975)，时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每周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代表国民党对外发布新闻。

②美国援华会(China Aid Council)，抗战初期同情中国人民的美国友人成立的民间组织，曾为中国人民的抗战募集医药物资和资金。后并入美国联合援华会。

③中国运动委员会，1937年9月在英国建立的民间组织，主要通过抵制日货、签名和募捐等方式，支持和援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逐渐失去作用。

致科林·麦克唐纳^①

1946年8月

尊敬的麦克唐纳先生：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想请你帮忙。这事和罗伯特·佩恩^②先生有关。两周前你曾替他预约与我见面。

佩恩先生来访时，给了我一本我丈夫的传记^③，是他与人合写的。我刚刚抽空读完此书。但是，我真希望在他来访之前我有机会先将该书浏览一遍。那样的话，我便可以就书中的一些误解和错误当面向他提出异议了。事已至此，我必须请你协助纠正这些错误，因为若对这些错误听之任之，不提出异议，那就会以讹传讹，将来有一天会被后人视为历史事实。想必你能理解我渴望纠正这些错误的焦急心情。

我没有时间在此信中罗列全部资料，所以，我将仅仅指出直接提到我的那些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错误说法。

作者说我在1914年和孙博士结婚。实际上是1915年10月25日。出于许多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的婚姻的确引起很大轰动，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秘密婚姻，也没有保密。如果佩恩先生和陈先生^④做更进一步的调查，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了。他们可以从很多国民党员那里了解到真实情况。就是上海这里，也有一些党员参加过我丈夫宣布我们结婚的那次茶会，他们可以提供所有的细节。

此外，佩恩先生和陈先生将我丈夫和我描绘成是在“知道历史会原谅我们”的情况下而投入这场婚姻的。原谅我们什么？作者在

致科林·麦克唐纳

这里将孙博士说成是重婚者，而事实上他在我们结婚之前已经离婚了。

至于所谓的孙博士前妻与我之间据说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的激烈争吵，我要说明的是，我从没有会晤过或是看见过我丈夫的前妻。至于佩恩先生所称孙博士力图为我争取的“平等地位”，这只存在于佩恩先生的罗曼蒂克式的想象之中，也许是那些在当时害怕这场婚姻会危害其特权和关系的党的寄生虫和拍马钻营的人触发了这种想象。如果佩恩先生有政治警觉的话，他本来会发现，即使在孙博士去世之后，我的政敌也未停止这些诋毁我的宣传，他们不希望被人提醒留待他们去完成的那些遗愿。

总而言之，我想说明的是，如果佩恩先生和陈先生让我读一下初稿，而不是把已经完成的作品交给我，那对读者就会公正得多了。在写作的过程中，如果能采访那些当年与孙博士和我同在东京的人，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向孙科博士和臭名昭著的反动分子潘公展^⑤——他当然不是孙博士的忠实追随者，因此也是我在政治上的死对头——这样的证明人求证，那也会更真实一些。

(据英文底稿)

^①科林·麦克唐纳(Colin McDonald)，时任英国大使馆新闻处工作人员。

^②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ne)，1911年出生于英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到中国，在前线亲历战争。曾在云南昆明一所大学任英国文学专业的教授，海军建筑专业的讲师。著作包